

生存的习惯

The Habit of Being

Flannery O'Connor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著 马永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Habit Of Being

生存的习惯

Flannery O'Connor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著
马永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OLLECTED WORKS: OCCASIONAL PROSE & LETTERS

By Flannery O'Connor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937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的习惯 / (美) 奥康纳著; 马永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3-0547-1

I. ①生… II. ①奥… ②马… III. ①书信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8241号

生存的习惯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著; 马永波 译

策划编辑: 瓦 当

责任编辑: 许 璇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47-1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散文部分
3	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9	教会与小说家
14	南方小说中的某些怪异方面
22	《玛丽·安回忆录》的前言
32	鸟中之王
42	区域性作家
47	小说是有历史的主题——应该这样教小说
50	新教南方的天主教小说家
61	书信部分

散文部分

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在对现代美国小说家的诸多抱怨中，最响亮的，即便不是最聪明的，是指责他没有为他的国家说话。几个季节之前，《生活》杂志的一份社论庄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为今天的美国说话？”其结论是，我们的小说家，或者至少我们最有天赋的小说家，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篇社论的主旨是，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繁荣，比起任何其他民族，它距离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更近，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正在写作的小说家，仿佛是生活在垃圾堆旁边的装货箱里，等待获准进入济贫院。与此相反，社论请求小说家给我们提供一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东西，它在结尾非常流畅圆滑地转向一个更高的调门，进一步要求小说家给我们展示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它说，“我们的温室文学最为缺乏的”是“生活本身的乐趣”。

这足以让人恼怒，激起许多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回应，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人是从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家的特定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人，至少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一样，对“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感兴趣。

这样的作家会把他的“国家”当成什么呢？在这方面，文学圈通常用的词语是“世界”。但是，“国家”一词也是胜任的。事实上，这个词更到位，更恰当，因为它能让人想起更多的东西。它暗示着一切，从小说家所描绘的实际的乡村，从他所处地区和民族的独有特色，到他真正的国家，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认为这一切都是永恒和绝对的。这种涵盖范围是可观的，如果一个人在谈论其他类型的写作而不是小说写作，他也许就不得不说“国家们”。但是，小说家的特殊责任在于，他

必须使一个国家代表所有的国家，他必须通过他能够信任的生活的具体细节来再现这个国家。

这是一份最为重要的天职，这份天职是一种限制性因素，它甚至能延及作家能够通过想象去领会的那种材料。作家可以选择写什么，但是他无法选择他能够以何为生。就他所关心的而言，一个生动的畸形人物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个僵死的正常人却是不可接受的。基督徒作家尤其相信，无论他最初的天赋是什么，它都是来自于上帝。无论这份天赋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不会情愿把它用在合适的限制之外，并因此使之毁灭。

作家以最为客观的方式所关心的国家，当然是最为直接地环绕着他的地区，或者就是简单的乡村，他懂得充分采用它的风格。一般而言，南方作家在这方面有某种优势。当今的大多数读者一定已经厌于听到南方作家和南方写作及这么多评论家坚持称之为“南方派”的东西。没有人弄明白过“南方派”到底是什么，哪些作家属于这个流派。有时，在最为尊敬的意义上，它似乎指一小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范德比尔特兴旺起来的重农主义者。但是这个术语更多唤起的往往是哥特式怪物的形象，和对畸形与怪异的迷恋。我相信，我们这些人大部分被认为是爱伦·坡与厄斯金·考德威尔^①的不幸结合。

然而，至少，我们全都以苦恼而为人所知。那篇社论的作者问题中暗示到，我们的苦恼是因与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隔绝的结果。我感觉大多数南方作家对此是闻所未闻的。我们大部分人的苦恼从现在看来，不是源于南方与国家其余部分的脱节，而是源于它脱节得还不够，每一天我们都变得与国家的其余部分越来越相似，我们被迫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许多罪孽，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美德。这可能是非神圣的苦恼，但毕竟是一种苦恼。

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风格都是至关重要的。糟糕的风格也强于根本没有风格，因为我们正在丧失我们习惯的风格，所以我们可能对它们有过强的意识，这似乎是产生作家的一个条件。在南方，有比河流与溪流更多的业余作者。在几乎每一个小村子，你都能发现至少一位

① 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1903—1987），美国作家，创作了包括《烟章路》、《上帝的小块土地》等小说，其作品塑造了大量南方人物形象。

女士在用黑人方言写史诗，两三个老绅士正在写作不真实的历史小说。树林中充满了区域性作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是任何严肃的南方作家的噩梦。

作家自己也许感觉到，使自己免于成为他们中一员的唯一途径，是检视自己的良知，在终极关怀的光照下观察我们强烈但日渐衰弱的风格。其他人可能说，逃避成为地域性作家的方法是扩大地域：不要做一个南方作家，要做一个美国作家。表现这个伟大的国家——它正在享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繁荣，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它几乎创造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面对所有这些繁荣、力量和无阶级性，你怎么就不能诚实地创造出一种文学，来清晰地表现生活的乐趣呢？

持有基督教立场的作家，也许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也是一样，他们会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在我们无与伦比的繁荣和文学要展现生活乐趣的尖锐要求之间，是否存在不发生某种丑陋关联的可能性。他至少有权发问，如果我们的繁荣社会真的充满了欢乐，这些对快乐的强烈要求是否会这么刺耳。

基督徒作家将认识到，在幻象的最深处，隐含着道德判断。当我们根据调查统计来再现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被迫将神秘与风格分开，将判断与幻象分开。为了产生出对于现代风尚来说更为愉快一点的东西，我们被迫以统计学的原则来塑造我们的良知，那就是把相对的当成绝对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种良知，既然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有明确信仰的年代，但是对于天主教徒作家来说，它可能不是一种良知，甚至不可能是。他将认识到，长时间服膺于这种东西，都会产生一种沉闷、无形式的、伤感的文学。这种文学将为那些把精神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的人提供一种精神目标，为那些混淆了美德与满足的人提供一种快乐的感觉。小说家关心的是事实，但是，如果事实可以由民意调查来确定，那么，金赛博士^①与盖洛普博士^②的门徒就够了。

① 金赛博士（Alfred Charles Kinsey, 1894—1956），美国著名性学大师，其发表于1948年的《男性性行为》开启了美国人对性的空前讨论，另有《女性性行为》（合称《金赛性学报告》）。

② 盖洛普博士（Dr. Gallup, 1901—1984），美国数学家，抽样调查方法创始人，民意测验组织者，因对1936年美国大选的准确预测而声名大振。

在最伟大的小说中，作家的道德感是与他的戏剧感相一致的。我看不出还有别的途径来实现这点，除非他的道德判断恰恰内在于他的观察行为，而且他能够自由地使用它。我听人说，基督教信仰对于作家是一种妨害，但是我自己没有发现任何偏离真理的东西。实际上，它让小说家得以自由地去观察。它不是一套确定你在世界上看见什么的规则。它保证了作家对神秘的尊重，从而在本质上影响到他的写作。

温德姆·刘易斯在他的小说集《腐烂的山》的前言中写道：“如果我写一座正在腐烂的山，那是因为我蔑视腐烂。”当下对作家的指责是，他们描写腐烂，因为他们喜欢腐烂。有些人确实如此，他们的作品会背叛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能不相信，有些人写腐烂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它，辨认出了它本身。

然而，很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如此明显地缺乏精神目标和生活乐趣，如此匮乏的小说实际上是否还是可信的？在这件事上我唯一必须检视的是我自己的良知，当我注视着我写下的小说，我发现它们大部分是关于穷人的，关于身心都在遭受折磨的人的。他们很少有——或至多只有一种扭曲的精神目标的感觉，他们的行为显然不能让读者深深地确信生活的快乐。

怎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不是不相信精神目标的人，也不是一个盲信者。我从基督教正统的立场来观察事物。这意味着对我来说，生活的意义集中在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上面，我是在世界与救赎的关系上来看待世界的。我不认为这个立场可以半心半意地接受，或者特别容易在当下小说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这里就有一位南方作家，而且恰恰是南方生活培育了这种类型的想象力，这个事实会让有些人借机指责对怪异的迷恋。我写过一些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畸形人物的小说，但是它们马上就被非南方读者冠上了怪异的标签。我发现，很难相信在一个地区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在另一个地区可能完全没有对应物。至少在最近，南方作家有机会指出，不是我们发明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①。与他的流行相比，那个年轻人本身也

①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 1935—1977），美国歌手，绰号“猫王”。

许不值得关注，他的流行不限于这个国家的南部。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这样，发现不怪异的东西，确定我们在观察中使用什么样的标准。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下观察事物的作家，在当下，将会拥有最为锐利的目光来识别怪异、堕落和不可接受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作家可能无意识地感染了摩尼教的精神，为备受争议的感官与信念之间的脱节所苦。但是我认为，对于堕落的这种关注的更大原因，在于他们的信念与读者信念之间的区别。救赎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原因。可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操纵我们文化的世俗信念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原因。

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家会在现代生活中发现令他厌恶的扭曲，他的问题是让这些东西在一个习惯了将之视为自然的读者那里显现为扭曲。他很可能被迫要采取较为激烈的手段，让他看见的东西抵达这个有敌意的读者。当你能够假设你的读者怀有与你一致的信仰，你就能放松一些，并使用较为平常的方式与之说话。如果事情相反，你就不得不用震惊来使你看见的东西明显起来——对于近乎耳聋的人，你要大声喊叫；对于视力不清的人，你要画出大而惊人的人物。

除非我们愿意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来接受我们的艺术家，否则，对于“谁为今天的美国说话”这个问题，回答就必然是：这是广告手段。他们完全有能力展示我们无与伦比的繁荣、我们几乎无阶级的社会，没有人指责他们不乐观。在艺术家依然得到信任的地方，没有人会指望他做出保证。那些相信艺术源自一个健康心灵，而非一个病态心灵的人，会将艺术家展示给他们的东西视为一个启示。这启示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无关，而是与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我们是什么样子有关。这个启示虽然有限，但毕竟还是一种启示。

当我们谈论作家的祖国时，我们很可能忘记了，无论那是怎样特殊的祖国，它都内在于他，同时也外在于他。艺术需要一种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微妙调节，无需改变它们各自的本质，它们就能通过对方彼此看见。认识一个人的自我就是认识一个人的地域。同样，认识世界，就是悖论地从世界中放逐。作家一旦不再把国家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他就失去了价值，对于自己也对于他的国家。归根结底，认识自己就是认

识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要用真理来衡量自己，而非其他。自我认识首先带来的是谦卑，这种美德在任何民族性格中都不是显而易见的。

耶路撒冷的圣西里尔在指导慕道友时写道：“巨龙蹲在路边，盯着过往的行人。小心别被它吞掉。我们前往灵魂之父那里，但我们必须从巨龙身边经过。”无论龙以什么形式出现，这个神秘旅程都要经过它，或通过它的爪子。任何有深度的小说始终关心的是这种神秘，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需要相当的勇气，才能保证自己不会从小说家身边转身离开。

教会与小说家

指出格雷厄姆·格林^①在我们中的存在，并不是总能回答关于教会对天主教小说家有何影响的问题。你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在艺术中得出结果的天才，也要考虑迷途的和从未得到发展的天才。一九五五年，《四季》（费城拉萨莉学院出版的一份季刊）的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天主教大学毕业生中缺少天主教作家的论文集，并随后出版了来自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作家、批评家对本论文集的反馈信件。这些反馈中包括了菲利浦·怀利^②先生的声明。他说：“一个天主教徒，如果是虔诚的，热衷于他的教会的权威，他也就被洗脑了，无论他自己是否认识到。”（因此他也就丧失了作为一流的创造性作家所必需的自由）也有经常被人重复的说法，认为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受害于审美上的褊狭和文化上的僵化。有少数人认为，天主教徒和其他群体一样，总是很难从中发现创造性的头脑。也有一些人认为时代要负责任。

大学机构一定认为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天主教作家会认为这是个人问题。无论他是否毕业于天主教大学，如果他接受教会所信奉的一切，他就必须确定教会对他的要求，以及他的自由是否受到和如何受到教会的限制。小说的材料和方法始终不变，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对小说家而言比对其他人更为严重。

对于小说家来说，一切都在考验着他的眼睛——一个最终能包容

①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格林是一个天主教徒，宗教主题是他最擅长的创作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派往非洲，战后他创作了大量间谍小说。

② 菲利浦·怀利（Philip Wylie，1902—1971），美国作家，代表作 *Gladiator, The savage Gentleman, when worlds collided*。

整个个性的器官，就像包容整个世界一样。瓜尔蒂尼阁下曾经写到，这只眼睛的根源在心里。无论如何，对于探索神秘深处的天主教徒来说，现代世界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试图消除神秘，另一部分试图在比宗教更为非个人化的原则中重新发现神秘。怀利先生的主张是，天主教作家因为相信某些确定的神秘，因此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性来直接看待事物。这个论点，事实上，与天主教徒声称无论天主教作家能看见什么，都有一些事物是他不能直接看到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些天主教徒是审美褊狭和文化僵化的牺牲品，发现他们与怀利先生分享同样的文化基础，即便在一瞬间，那也是很有趣的。

并不仅仅是天主教徒，而是人们普遍认为，写小说的天主教徒是用小说来证明信仰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想证明超自然的存在。有可能如此。没有人能确定他的最低动机，除非这些动机在他已完成的作品中显示出来。但是当已完成的作品表明那些相关行为受到了不正当的操纵、忽视或者窒息，无论作家一开始的意图是什么，他都已经失败。如果小说家能够有所发现，他会认识到，自己是不能为了抽象真理的利益来移动或塑造真实的。作家也许比读者能更快地了解，要谦卑地面对事实本身，与他有关的仅仅是事实本身。他的媒介是具体的。他最终将认识到，小说只有处于自己的局限之内，才能够超越这些局限。

亨利·詹姆斯曾说：小说的道德依赖于里面“感性生活”的量。天主教作家，只要他遵从教会的思想，他就能从核心的基督教神秘的立场去感受生活。尽管那是可怕的，但它是上帝所确立的，是值得为之而死的。不过，这种情况应该扩大而非缩小他的视野。对于怀利先生所代表的现代头脑来说，这是扭曲的观点，“如今天众所周知的那样，与真理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不为一个有限的天主教信徒的圈子写作的天主教徒很有可能会认为，既然这是他的观点，他是在为一群有敌意的读者写作，那么，他将更加关心让他的作品立足于自身，完整而自足，凭本身的质量而不受影响。当人们告诉我，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就不能做一个艺术家时，我只能悲伤地回答，正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就很难不是一个艺术家。

任何作家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都是来自材料本身中存在的必

要性，这些限制总体上将比任何宗教所能强加的限制更为严格。天主教小说家的问题的复杂，部分在于恩典的存在。恩典出现在自然中，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的信念不会与他的戏剧感脱节，不会脱离他对真实的认识。然而，在当下，没有人比天主教徒更渴望这种脱离，他们要求作家在自然的层面上，限制他允许自己看见的东西。

对于那些普通的教徒读者，如果通过他给编辑的信和其他让他瞬间显露自身的媒介能够追踪到他的话，我们会发现他更像一个教会所不允许的二元论者，将自然与恩典尽可能分开。他将自己对超自然的观念缩减成了虔诚的陈词滥调，从而能够以仅有的两种形式在文学中辨认出自然。这两种形式就是感伤的和淫秽的。他将选择前者，同时保留对后者的更大权威，但是他一般总是把握不住两者之间的共性。他忘记了感伤是一种过度（excess），感伤的扭曲（distortion）一般是由于对无辜（innocence）的过分强调，那种无辜只要在普通人类条件下被过度强调，就往往会被某种自然法则转变成它的反面。我们在堕落中失去了我们的无辜，我们通过救赎返回无辜，那是由基督之死和我们的缓慢参与所带来的。感伤跃过了这个过程，并过早抵达了一种模拟状态的无辜，它强烈地揭示着它的对立面。在另一方面，淫秽在本质上是感伤的，因为它排除了性与它的实际意图的关联，使它与其在生活中的意义相脱离，以致使它仅仅成了为了自身利益的一种经验。

对宗教文学历来有许多根据十足的抱怨，人们认为它往往会将尘世生活的重要性和尊严缩减到最小，从而有助于来生或恩典的神奇显现。如果按照小说的本质去创作小说，凭借将小说奠基在坚实的可观察的真实之上，它应该能强化我们对超自然的感觉。如果作家在他的信仰的真实保证下使用自己的眼睛，他就必须诚实地使用它们，这样，他对神秘的感觉和对神秘的接受度会得到增加。对他来说，去观察最糟糕的事物只不过是上帝的一种信任。但是对于作家是一回事，对于读者可能是另一回事，引导作家走向救赎的东西可能会将读者引向罪恶，而正视这种可能性的天主教作家就是在直视美杜莎的脸，他会被变成石头。

任何存在这种困扰的人都应该接受莫里亚克^①的建议：“纯净源头。”并且要连带认识到，当他在尝试那么做的时候，他必须坚持写作。他也要意识到，相对而言，似乎足够纯净的源泉却产生了让人感到冒犯的作品。他会感觉到，冒犯有学识的人和冒犯无知者一样，都是有罪的。到最后，他或者不得不停止写作，或者限制他自己，恰当地关心他正在创造的东西。不能遵从这两条道路的人会变成牺牲品，不是教会的牺牲品，而是对教会需要的错误理解的牺牲品。

保护灵魂免受危险文学的伤害，实际上属于教会的分内之事。所有小说，甚至在它满足了艺术需要的时候，到最后也不会适合所有人的消费。如果有一些不适合的情况，教会就应当禁止信徒去阅读未经许可的作品。作家如果本身是天主教徒，他就要感谢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这种服务，这意味着他能将自己限制在艺术的要求上面。

事实在于，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承担普遍的灵魂的责任要比生产一部艺术作品要容易，他们认为拯救世界要好过拯救作品。这种观点也许要归因于浪漫主义，同样也要归因于虔诚，但是作家不大会喜欢，除非那是糟糕的教育强加给他的，或者是写作并非他的首要天职。很难否认，这种观念是这个国家的天主教虔诚气氛强加给他的，即便无法将每一个天才的被扼杀都归咎于这种气氛，它至少在总体上也足够让怀利先生的看法显得可信，他相信基督教教条对创造性思想的制约。

对于固定教条的信仰不能确定生活中发生的事物，也不能使信仰者对之盲目。当然，它会给作家的观察增加一个维度，许多人在良知上无法认识到它的存在，但只要他们能认识到它，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就无法声称自由拒绝了艺术家。拿掉一个维度是一回事，增加一个维度是另一回事。天主教作家和读者必须记住，判断这个增加的维度的现实性，要凭借自然事件在小说中的表现是否真实与完整。如果天主教作家希望揭示神秘，他就必须将他所看见的东西描述得真实不虚。肯定的观念不一定会限制他观察人类怎么对待上帝造物的自由。

如果我们意欲激励天主教小说家，我们必须使人们确信，教会不

① 莫里亚克（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幼年丧父，由虔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成人，终生信奉宗教。他一生创作颇丰，有《爱的荒漠》《蝮蛇结》等作品，195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会限制他们做艺术家的自由，反而会确保这种自由（艺术的限制是另一回事），并且要让他们相信——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需要一批天主教读者能够在他们认为淫秽的段落之外，从小说中辨认出什么东西来。人们普遍认为，任何能阅读电话簿的人就能读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还有，在天主教徒中间能更多地发现这样一种态度，既然我们拥有教会的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能直接用这个真理作为判断任何原则的工具，而无需顾及这原则本身的性质。天主教读者不断受到小说的冒犯和伤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阅读准备，而实际上这些作品却往往渗透着一种基督教的精神。

当个体的信念虚弱而不是强大的时候，他会害怕对生活的诚实的虚构式表现。而当人们倾向于将精神分隔开来，使之居于唯一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之中时，其对超自然的感觉就很容易逐渐丧失。按照自身规律创作的小说，是这样一种趋势的解毒剂，因为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神秘之中的，从这神秘之中，我们汲取出我们的抽象原则。天主教小说家，作为小说家，将首先在他的艺术的规律和限制中寻求上帝的意志，如果他服从这种意志，他就会希望有其他的祝福被添加到他的作品中。那个最幸福的人，可能他最为意想不到的人，将是那满意的天主教读者。